

社会网络的概念、测度及其影响： 一个文献综述^{*}

□ 郭云南 张晋华 黄夏岚

内容提要 本文从社会网络的概念出发,诠释了社会网络的内涵、不同的度量方式以及在微观行为中的影响。具体而言,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因共享信息、提供担保或分担风险的优势,在平滑消费、增加投融资、促进就业、减少贫困和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它在资源配置方面可以弥补正式制度发展不足的缺陷。更为重要的是,正式制度(如正规金融体系、民主选举)的逐渐发展可能减弱也可能加强原有社会结构中的社会网络的作用。

关键词 社会网络 社会资本 非正式制度 文献综述

作者郭云南,通讯作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讲师;(北京 100029) 张晋华,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讲师;(杭州 310023) 黄夏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讲师。(北京 100029)

DOI:10.14167/j.zjss.2015.02.018

一、引言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强调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收入增长中的关键作用,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中,社会资本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有着世界上数目众多的农民,却是近三十年来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类似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收入和经济发展的作用也开始受到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社会资本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是社会网络,它是人与人之间互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联体系,因其最容易测量,影响最为直接,国内外相关研究最多。近年来,随着社会网络从社会学向经济学的过渡,大量文献已经对社会网络的一些基本问题达成共识,但也发现很多争议性的话题。目

前,有必要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进行系统性的回顾与综述。这些基本问题包括:

(1) 社会网络的概念如何从社会学过渡到经济学?具体包括哪些不同的内涵?(2) 社会网络作为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在经济研究中如何准确定义和测度社会网络?(3) 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对微观个体行为或资源配置的影响有哪些?究竟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4) 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如果社会网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可以弥补正式制度不足的缺陷,那么,这种影响是如何随着正式制度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的?

这些问题也是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讨论的焦点。本文试图从社会网络的基本概念出发,以社会网络向经济学的演变过程为基础,对上述问题

^{*} 作者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303046)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创新团队资助项目(数量经济学理论与应用创新团队,项目号CXTD4-01)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但文责自负。

的文献研究进行综述。本文余下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基于社会网络的理论发展,诠释社会网络的概念及其内涵,第三节总结现有经验研究中所讨论的社会网络以及不同的测度方法,第四节探讨社会网络在微观个体行为中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第五节进一步讨论社会网络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随正式制度的发展而变化的相关研究,最后一节是总结。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类似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宏观层面的研究也是汗牛充栋。但本文将研究集中于社会网络对微观个体行为的影响,将不会涉及社会资本的研究。^①

二、概念与诠释

社会网络也被称为关系,是指一群特定人之间的所有正式与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之间直接的社会关系以及通过物质环境和文化共享而结成的间接的社会关系(Mitchell, 1969)。对社会网络的理解最初贯穿于社会资本的研究中,强调社会网络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内在特性。最早在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中提出社会网络的是 Jacobs (1961),他将“邻里关系网络”作为社会资本进行城市社区的研究,这种将社会网络视为社会资本的研究方法一直被沿用至今,并且成为当前社会资本的主要研究范式之一。其后代表性的研究有, Bourdieu (1986) 将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联系起来,并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由网络共同熟识或认可而形成的社会资源。紧接着 Coleman (1990) 提供了对社会资本更广泛的理解,他指出,类似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具有生产性,不仅是增加个人利益的手段,而且是解决集体行动的重要生产性资源。值得指出的是,他首次正式提出了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社会网络具有获取信息的功用,在增加个人或集体利益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Putnam (1993) 进一步明确指出社会资本是由社会网络、规范和信任这三种要素构成,并将社会资本定义为“能够通过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经济效率的社会网络、信任和规范”。社会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是人与人之间互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联体系,并具有一般资本或资源的属性,网络的规模或大小也直接依赖于个人

拥有的社会资源的数量。

理解社会网络的另一种视角来源于社会网络分析,这是 19 世纪 70 年代后在社会学领域产生的新话题。如果说社会资本的研究强调社会网络规模与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源有关,社会网络分析则是从结构的角度侧重于社会网络强度及其影响因素。在社会网络分析中,“网络”可视为行动者的一系列社会关系或社会联系,由行动者和社会关系构成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 (Emirbayer and Goodwin, 1994)。Granovetter (1973) 首次提出了关系强度的概念,强关系是在性别、年龄、教育水平、职业身份、收入水平等社会经济特征相似的个体间发展起来的,而弱关系是在社会经济特征不同的个体间发展起来的。这种代表同质性的强关系使得获得的信息往往具有较大的重复性和剩余度,从而对个人的帮助不大;代表异质性的弱关系则可以跨越其它阶级界限去获得信息和资源,从而充当了不同社会群体间“关系桥”的作用。换言之,社会网络的强度取决于行动者或网络成员的异质性。异质性越大(定义为“弱关系”),社会网络在获取信息方面的作用会越强。

除网络成员的异质性外,社会网络的强度还取决于社会关系的结构性状。比如个人在网络中的位置 (Lin, 1982) 或个人拥有“结构洞”的数目 (Burt, 1992)。前者是美国华裔社会学家 Lin 于 1982 年提出的“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网络理论。他指出个人在网络中的位置或社会地位将直接决定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在一个社会网络中,个人对社会资源控制和汲取的能力呈金字塔状分布,处在或接近金字塔顶端的人,往往获取信息和汲取资源的能力最强。后者是 Burt 于 1992 年在《结构洞:竞争的社会结构》(“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一书中提出的“结构洞”的概念及其理论。他指出社会网络中某些个体之间发生直接联系,而其他个体之间不发生直接联系或出现关系中断,从网络整体来看好像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这种网络成员间的关系断裂或不均等称作“结构洞”。他认为,拥有“结构洞”的人,其角色类似于“中介或第三方”,对信息和资源的获取、整合及控制都占据绝对优势。所以,“结构洞”理论的核心在于“在由群体形成的社会网络中,个人关系

的强弱与其拥有的社会资源的多寡没有直接的联系,而是依赖于他占据‘结构洞’的多少”(Burt, 1992)。与 Granovetter (1973)、Lin (1982) 不同, Burt 的创新之处在于他真正揭示了关系强弱的本质,他认为关系的强弱决定于人们建立的社会网络是非剩余的(网络结构不均等)还是重复的(直接联系的人较多)。

如果说 Bourdieu (1986)、Coleman (1990)、Putnam (1993) 等学者主张网络联系的多少是社会资本产生的条件,那么 Granovetter、Lin 以及 Burt 等更进一步强调,网络成员(或行动者)的异质性以及社会关系的非重复性,使得网络在获取信息和控制资源等方面具有优势地位,从而表现出社会网络更强。

此外,社会网络关系的强弱还依赖于社会关系的形成纽带,比如物质环境或固有的文化特征,这也是学者们关注社会网络最常见的方式。形成纽带不同,社会网络的强弱也有所不同。Bian (1997) 以中国为案例分析社会关系在个人求职过程中的作用,提出了“强关系假设”。他认为,个人的求职渠道依赖于由亲戚构建的强关系,这种强关系可以充当没有联系的个人之间的桥梁。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1998)将中西社会结构进行对比后,提出“差序格局”的概念,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一块石头丢在水中,而推出去的一圈圈的波纹,每个人都是这些圈子的中心”。在费孝通看来,中国的社会关系是以自己为中心逐渐向外推的,表明了自己与他人的亲疏远近,往往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关系成为了中国农村最重要和最稳定的社会网络之一。类似于印度的种姓网络或部分非洲国家的种族网络,宗族是“有着共同祖先且父系单线延续的合作组织,其成员自觉地与组织外成员区分开来,并共享组织的资源(如土地、声誉或市场信息等),与宗族内成员互惠互利并共担责任(Freedman, 1971; Watson, 1975)。”那么,与地缘或朋友等网络不同,这种乡土文化决定了宗族网络的强度或凝聚力(Tsai, 2007)。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定义的社会网络概念是最为广义的社会网络概念。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网络的大小与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源相关。作为一种结构关系,社会网络的强度取决于网络成

员的异质性、社会关系的非重复性或连接纽带的差异。但在学术文献中,往往因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关注某一种社会网络,比如印度的种姓网络、美国的俱乐部网络、部分非洲国家的种族网络以及中国农村的宗族网络、地缘网络、姻亲网络或朋友网络等。国外文献中因种姓网络、种族网络的主导性而受到更多关注。在国内,相比其他网络,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网络或亲属网络因中国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属性而成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

三、测度方法及存在问题

社会网络测度的关键在于如何反映网络的规模和强度。因社会网络概念在理论上的宽泛性,实证上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对社会网络的度量差别比较大。除少数以外,主要从行为指标对社会网络进行度量。如“找工作时可提供帮助的亲戚或朋友的数量”、“婚丧嫁娶时亲戚间的礼金往来”、“节假日拜访的亲戚或朋友的数目”等,这些指标难免会出现内生性问题。

首先,行为指标往往依赖于被试的主观意识,难免会出现低报或高报的可能性。当采用这些指标度量社会网络时,容易导致测量性误差。文献中提到的有,陈钊等(2009)“找工作时有多少人可以提供帮助”、李爽等(2008)“想调动工作时估计可以寻求帮助的亲戚朋友的数目”等、章元和陆铭(2009)“赠送给亲友的礼金价值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等。

其次,行为指标也容易带来遗漏变量问题。文献中常用“亲友间的礼金往来”度量家庭的社会网络来研究社会网络对家庭行为的影响。一般来看,虽然亲友间的礼金支出与家庭的社会网络高度相关,高的礼金支出往往也是维持社会网络的一种方式。然而,礼金支出的数量可能依赖于家庭背景或户主的性格特征等不可测量的因素,并且这些因素也影响个人行为。如相比性格内向、胆小的人,更活泼开朗、更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更可能外出打工或发生借贷行为等。而这些性格特征是无法观察或度量的,但同时影响着社会网络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从而造成了遗漏变量问题。文献中提到的有,赵剑治和陆铭(2009)“家庭春节和婚丧嫁娶支出占日常支出的比重”、章

元和陆铭(2009)“赠送给亲友的礼金价值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马光荣和杨恩艳(2011)“亲友间礼金往来数额”等。

第三,行为指标也可能引起双向因果问题。当在研究社会网络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时,一方面,收入更高的家庭更有能力去构建社会网络,另一方面,恰恰是那些能力较弱的人反而希望通过网络构建来提高家庭收入。于是,社会网络可能直接影响家庭收入,反过来,家庭收入可能也影响社会网络的构建。换言之,社会网络的构建或规模往往会与个人或家庭的经济条件或个体行为互为因果。文献中提及的有,张爽等(2007)“在政府、学校和医院工作的亲友数量”、赵剑治和陆铭(2009)“家庭在政府和城里工作的关系密切的亲友”、周群力和陆铭(2009)“春节是否给中小学老师拜年及是否交赞助费”、章元和陆铭(2009)“赠送过礼金的亲友数量”、Zhang and Li(2003)“是否有家庭成员外出打工及家里是否有村干部”、边燕杰和张文宏(2001)“非亲友的直接或间接相识、朋友关系及血缘或姻亲关系”、Zhao(2003)“在迁入地来自同村的人数”、Chen et al.(2008)“外出打工人数占村庄总人数的比重”等。

总结来看,行为指标似乎并非直接测度社会网络,而是从网络的功用或使用网络的角度来考虑,难免会有一定的偏差。不过,少部分国内文献以“人口规模”来直接测度社会网络,这在关于社会网络与风险分担、集体公共品投资及企业发展等方面有所体现。如 Xu and Yao(2009)、Peng(2004)、Chen and Huhe(2010)运用“第一大姓在村庄中所占人口比例”来度量农村社会网络。然而,规模仅从数量上刻画了社会网络的大小,却未必能反映网络内部成员间关系的亲疏远近或凝聚力的强弱。Freedman(2004)指出姓氏人口比例高的网络在形式上可能会比较松散,组织起来也有一定的难度。Huang(1998)、Karlan et al.(2009)也发现网络的组织性(或凝聚力)在内部成员的互惠互利行为中发挥的作用更为明显。因此,除社会网络规模外,从网络强度这一维度刻画网络的组织性或凝聚力显得尤为重要。这在宗族网络的研究中有所体现。阮荣平和郑风田(2012)、彭玉生(2009)、孙秀林(2011)以及郭云南等(2013)以“宗族是否存在祠堂(或家谱)”、“是否存在正

式的宗族组织”等来度量宗族网络的强度,认为祠堂(或家谱)的有无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来反映宗族的组织性或凝聚力的强弱。^②Tsai(2007)也指出祠堂的建立或家谱的修订往往伴随着宗族的集体仪式或活动(如崇拜祖先的仪式,平息纷争的宗族长老会议等),加强相互间的凝聚力或责任意识,也就是说,祠堂或家谱可以为宗族内部成员的交流与协作提供一个基础和可能性,使得他们更便利地去使用网络。

文献中还指出,社会网络的强度(或凝聚力)在网络成员间的互惠互利、风险分担或其它行为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可能比规模层面的作用更加明显。郭云南和姚洋(2013)、郭云南等(2013)从“姓氏宗族的人口比例”和“姓氏宗族是否有祠堂或家谱”两方面测度宗族网络的规模和强度,发现以家庭姓氏人口比例衡量的宗族网络规模对家庭劳动力迁移、融资以及创业等方面的影响不大,而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宗族网络的强度。姓氏宗族修建祠堂或家谱为内部成员间的交流协作提供了一个基础和可能性,使得他们更便利地去获取资源或创业机会。

相比行为指标,社会网络的直接度量存在明显的优势。比如行为指标往往是及时性事件,因而会产生内生性问题。而是否修建祠堂或家谱往往是历史性事件,对于我们研究的因变量而言是外生的。但在实证研究中,往往因数据的天然缺陷而对社会网络的度量不全面,因此造成社会网络的作用被低估的现象。

四、社会网络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社会网络作为社会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因其在获取信息、汲取和控制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在解决个人行为方面的研究是汗牛充栋,目前主要集中在风险分担与平滑消费、融资与投资、劳动力迁移与就业、家庭收入及其分布等方面。我们逐一展开如下。

(一) 风险分担与平滑消费

平滑消费一直是发展中国家研究的主要议题之一。对于农村人口数目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较大的收入冲击使得他们在村庄或社区范围内的平滑消费是不完全的(Jalan and Ravallion, 1999; Fafchamps and Lund, 2003; DeWeerd and

Dercon 2006)。于是,人们进一步考察有助于提升风险分担程度的组群或网络。Townsend(1994; 1995)指出由亲戚朋友构建的社会网络使得个人具有更完全的消费保险,但并未解释消费保险程度是如何依赖社会网络的。而 Munshi、Rosenzweig 等学者以印度的种姓网络为视角对家庭收入风险及平滑消费作了比较细致的研究。他们发现,以种姓为纽带的社会网络可被视为一种担保或保险机制,促进成员间的转移支付或借贷,有效地缓解家庭的收入冲击,从而促进家庭平滑消费(Rosenzweig and Stark, 1989; Rosenzweig, 1988; Munshi and Rosenzweig, 2009)。另外, Angelucci et al.(2008)指出以姓氏为纽带的社会网络可以提升网络成员间平滑消费的程度,这主要是由于成员间通过信息传递或共享等方式进行风险分担。

关于社会网络与收入、风险偏好异质性的文献揭示了社会网络在风险分担方面的作用,也进一步表明网络效应的差异可能存在于不同性质或不同结构的社会网络中。一方面,社会网络在应对风险和平滑消费中所发挥的作用往往决定于网络的性质。如果社会网络由具有相近风险偏好的人、或彼此了解或信任的亲戚或朋友等构成,则社会网络在风险分担中所发挥的作用将更大(Attanasio et al., 2012; Coate and Ravallion, 1993)。另外,网络的强度或凝聚力也是网络分担中的关键要素。Bramoulle and Kranton(2007)从理论上指出风险分担在社会网络中的不对称性,风险分担网络只会由少数同类人形成,网络所起的作用依赖于成员与成员间联系的深度和广度。Fafchamps and Gubert(2007)运用菲律宾北部村庄的调查数据,分析风险分担网络形成的决定因素。结果发现,家庭间社会联系的形成并不依赖于家庭间的收入差距,而是决定于家庭间的居住距离。两个家庭相隔越近,更可能相互间提供捐赠或私人借贷,建立联系而共担风险。以中国农村为案例,Huang(1998)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庭注重于个体利益,而非整个家族的整体利益,以血缘为纽带的亲属网络于是在互惠互利或风险分担中的作用并不明显。然而,风险分担或互惠互利的作用可能主要体现在血统较近的亲属网络中。

另一方面,社会网络在风险分担中所起的作用依赖于网络结构。如 Ambrus et al.(2010)探讨了

社会网络结构与风险分担程度,结果发现,多向联系的社会网络比单向联系的社会网络更广泛,使得成员间的风险分担更完全。以秘鲁村庄为案例研究,发现存在多项联系的社会网络结构可以使得村庄内部存在完全的风险分担。Blochet et al.(2008)指出社会网络成员间可以相互转移支付和信息共享,社会网络可被视为风险分担网络,并且社会网络结构直接决定了风险分担网络的稳定性。他们发现,在只是单项联系或者两两联系的情况下,成员之间的风险分担网络比较稳定,而当介于两种情况之间时,风险分担网络的稳定性较差。

(二) 融资与投资

近年来,国外关于社会网络与投资融资行为的研究非常丰富。一类文献关注社会网络对融资行为的直接影响,如 Fafchamps and Lund(2003)指出社会网络可以扩大融资机会。另一类文献进一步研究了社会网络在正规或民间信贷市场中的作用渠道。研究发现,因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问题是金融市场不完备的主要来源,社会网络则有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比如,不少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可以共享信息。首先,社会网络中成员往往居住邻近或交往频繁,相互监督成本很低,这有效缓解了道德风险问题(Karlan, 2007);其次,社会网络的成员彼此非常了解,低信用或高风险的成员可以被识别出来并被排除出信贷市场,这有效降低了逆向选择问题(Banerjee et al., 2012; Samphantharak and Townsend, 2010);最后,社会网络能够实施一定的社会制裁,使得违约者遭受声誉损失,进而降低违约的可能性(Karlan and Morduch, 2010)。除信息共享外,社会网络还能对融资行为提供一种隐性担保(Kinnan and Townsend, 2012; Karlan et al., 2009),使得网络成员获得更多融资机会。又如 Gajigo and Foltz(2010)分析了非洲国家基于种族的社会网络在企业融资中的重要角色。他们发现,来自大种族的企业家,利用其背后的种族网络,可以扩大融资渠道进而缓解投资的信贷约束。另外,社会网络的信息共享或担保角色,也为个人或企业的投资行为提供了便利,如孩子健康投资(Luke and Munshi, 2007)、生产性投资(Kinnan and Townsend, 2012)、教育投资(Munshi and Rosenzweig, 2006)等。

国内现有成果对农户借贷及投资行为关注较多(朱喜等,2010;马晓青等,2010),特别是农村金融改革以来,大量文献分析农户借贷行为及其表现形式。借贷行为需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农民以土地作为担保进行借贷及投资教育(李菁等,2002;李锐和李宁辉,2004)。在农村信贷市场上,非正式借贷形式比正式借贷形式更加普遍(朱信凯和刘刚,2009;史清华等,2004;金烨和李宏彬,2009;黄祖辉等,2009)。由于私人贷款者可以更好地评估借款者的信用级别、收入冲击及借款偿还的可能性,而银行或农村信用合作社往往缺乏这方面的信息,可能要求借款者提供更多的抵押品或给予更高的贷款利率,私人融资于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正规融资的替代(刘莉亚等,2009;甘犁等,2007)。近年来,国内少数文献开始从社会网络的视角关注农户的投资融资行为。在正规金融制度发展缓慢的情况下,因社会网络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种种问题,社会网络在农村信贷市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杨汝岱等,2011;胡枫和陈玉宇,2012;李锐和朱喜,2007),并进一步为农民的创业行为提供资金支持,从而有助于自主创业(马光荣和杨恩艳,2011;郭云南等,2013)。

(三) 劳动力迁移与就业

社会网络或“关系”在人口、劳动力流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胡必亮,2004;李培林,1996)。目前的文献对于社会网络在劳动力迁移与就业中的作用大概有三种观点。第一,信息共享。来自同一社区的成员在迁入地形成的社会网络,有助于共享资源与信息,从而帮助后续迁移者在新的迁入地找到高薪非农工作(Munshi,2003;2011;Calvo-Armengol and Jackson,2004)。文献中Zhao(2003)、Chen et al.(2008)、边燕杰和张文宏(2001)运用中国劳动力迁移或就业的相关数据也发现类似的结果。第二,为迁移成本提供融资渠道。如Dolfin and Genicot(2010)运用墨西哥——美国迁移数据,研究迁移网络促进外出打工的具体机制。结果发现,网络成员间能共享各种就业信息,为迁移成本提供相互融资,及在目的地的相互关爱等,从而提升家庭和社区的外出迁移的可能性。

第三 配给工作。章元和陆铭(2009)和章元

等(2008)指出在具有较高竞争性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社会网络的主要角色是配给工作或增强农民工的流动性,通过影响农民工的工作类型而间接地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佐藤宏(2004)也发现社会网络在克服进入国有部门的制度障碍方面有重要作用,它对于外出流动人员收入的影响会因就业性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与以往文献不同,Zhang and Li(2003)分析了不同性质的社会网络在个人从事非农工作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对非农工作的作用不同。能获得亲属或朋友帮助的个人更可能选择外出打工并获得高薪非农工作;家里有村干部的个人更可能获得当地的非农工作。类似地,社会网络对职业选择的作用在网络内部可能存在着异质性。如Munshi and Rosenzweig(2006)运用印度家庭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印度的低种姓成员在教育及职业选择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们发现,在印度的市场化进程中,以种姓为纽带的社会网络使得女性收入在不同种姓之间的趋同远高于男性,其原因是低种姓的男性从他的社会网络中受益更大而倾向于就读当地的学校进而从事低收入工作,而低种姓的女性从她的社会网络中受益较小而通过选择英语教育进而从事类似白领的工作。

(四) 收入增长与分布

社会网络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在促进穷人家庭摆脱贫困陷阱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它于是被称为“穷人的资本”(Grootaert,1999)。张爽等(2007)利用中国家庭在2003年的调查数据也有类似的发现,社区层面的社会网络对减少贫困有显著作用。Chantarat and Barrett(2011)对社会网络在促使穷人家庭摆脱贫困陷阱中的作用做了更进一步的研究。他们发现,在正规金融市场发展缓慢的情况下,社会网络可被视为一种物质资本的替代品或互补品,提高穷人家庭的劳动生产率并增加收入。这种收入水平的增加反过来能加强穷人家庭的社交能力,从而扩大社会网络资本。这种良性的循环,将可能最终促使穷人家庭摆脱贫困陷阱。类似地,社会网络通过加强村民间的合作,普及农业生产技术,传递农业生产信息,互惠互利并分担风险等方式增加收入(Narayan and Pritchett,1999)。

在文献中,社会网络虽然能促进穷人家庭增

收,但是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如赵剑治和陆铭(2009)运用中国农村家庭收入的调查数据,研究社会网络对农户间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他们发现社会网络扩大了农村收入不平等,社会网络对收入差距的贡献达到12.1~13.4%。类似地,Moguesand Carter(2005)从理论上发现社会网络(如血缘、地缘或业缘关系)可被视为一种无形资产或担保品,为拥有社会资本的人提供更多机会而增加收入。因此,给定初始的财富分布状况,社会网络的高度不平等将加剧后续的收入或财富的不平等。然而,社会网络对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也可能产生积极作用。如McKenzie and Rapoport(2007)从理论上和经验上显示地区迁移人口比例与该地区的收入不平等呈现倒U型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主要依赖于社会网络。由于初始高额迁移成本的限制,只有富人家庭有机会向外迁移,从而加剧了所在地区的收入不平等。但迁入地的社会网络一旦形成,有助于降低后续迁移成本,从而使得穷人家庭也有能力迁移增加非农收入,最终缓解了所在地区的收入不平等状况。郭云南等(2014)运用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也有类似发现,宗族网络通过传帮带或风险分担等方式降低外出打工成本,缓解流动性约束,提高穷人外出打工的可能性并增加收入,从而对缓解村庄内部的收入差距的扩大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五、社会网络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以上文献看出,社会网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资源配置和形成非正式制度方面,能够弥补正式制度发展不足的缺陷。然而,这种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在正式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会减弱,还是会嵌入到正式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去发挥更大的作用呢?理论上,正式制度的发展可能减弱也可能加强社会网络的作用(Nee,1996; Rona-Tas,1994; Bian and Logan,1996),近年来经验研究也争议不断。

其中一支文献是关于社会网络在农村民间信贷市场中的作用。社会网络对促进民间非正规金融起着重要作用,一直严重困扰正规金融机构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依靠社会网络得到了有效缓解。换言之,社会网络作为农村借贷的载体,它是一种非正式制度,会替代正规金融制度的职能。那么,

随着正规金融体系的不断渗透,社会网络在农村信贷市场中的作用将发生怎样的变化?郭云南等(2013)、马光荣和杨恩艳(2011)、杨汝岱等(2011)等给予了否定的回答。他们利用中国农村的微观调研数据,发现随着正规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人们能更便捷地从银行或农信社获得借款,宗族网络(或亲属网络)将不再是人们进行融资的唯一渠道,人们对民间借贷网络的依赖性也因此会有所减弱。也就是说,社会网络在民间借贷市场中的作用会随着正规金融市场的发展而趋于弱化。另一支文献讨论了经济转型过程中非市场化的力量(比如社会网络)。社会网络是一种对提高人们的福利和促进经济增长都非常重要的非市场化力量,那么社会网络的作用在经济发展或结构转型的过程中是否也将会减弱?张爽等(2007)发现社会网络对减少贫困的作用会随着市场化力量的渗透而降低。郭云南和姚洋(2013)发现宗族网络促进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传统农村会逐渐向现代农村转变,市场化的力量正逐步向农村渗透,宗族网络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作用会减小。

以上文献看似社会网络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会弥补正式制度不足的缺陷,但随着正式制度的发展,社会网络的作用会越来越小。然而,当人们开始关注村庄民主选举制度与当地非正式的宗族网络之间的互动关系时,还发现了相反的结论,村庄选举赋予了村民独立自主的权利,反而会因宗族之间的竞争性而增强对村干部的问责,宗族网络有助于增强民主选举对资源配置的效果。Tsai(2007)认为当选的村干部极易受到村庄内非正式组织的监督和约束,有寺庙、教堂、宗族等民间组织的村庄,其公共品投资的水平明显高于没有这些组织的村庄。Munshi and Rosenzweig(2008)研究基于印度种姓的村级选举发现,居于优势地位的种姓更可能当选,并伴随较高的村庄公共品投资。与此类似,Xu and Yao(2009)利用中国村庄数据指出,如果选举产生的村主任来源于该村最大姓,其任期内村庄自发的公共品投资将增加,原因在于,他(她)所属的宗族将会支持其政策并进行有效监督,使其更有效地实施权力。他们将这一现象解释为“权威耦合”,即由宗族产生的非正式权威与由选举产生的正式权威之间相

互重合、相互认可的情况。郭云南等(2012)从家庭个体的角度研究发现,在村民选举过程中,如果选出的村主任来自最大姓,则村庄更容易从村民那里收费,且没有明显增加对村民的转移支付。换言之,如果村庄的正式权威(村委会选举产生)和非正式权威(宗族)相结合的话,村委会更能凝聚人心,也更可能抵制再分配要求。

但现有文献也发现,村庄选举极易被宗族势力所“俘获”,导致民主选举对资源配置的扭曲(肖唐镖,2006;刘金海,2006;贺雪峰,2009)。Besley et al. (2004)指出当选村干部引发的公共品投资依赖于村庄中的姓氏结构。他们发现,比较均等的姓氏结构倾向于扩大外溢性公共品,但当选村主任的姓氏比例占据较大份额时,将会伴随着更多私人品的提供。Bassat and Dahan(2010)也发现村民往往会投票给同一姓氏的候选人,于是村庄中的大姓更容易当选,可能最终导致当选领导者的责任意识弱化。Maskin and Tirole(2004)指出官员们为获取连任可能与非正式的强势利益组织合谋而累积社会资本,牺牲少数人的利益而迎合大众。这种情形或多或少与Madison(1787)在美国联邦政府51号文件中提出的概念“大多数人的暴政”类似,即在位领导者不仅具有法律认可的诸项权力,而且由于获得了其背后强大组织(如第一大宗族)的支持,而采用亲利益相关者的政策,使得剩下少部分人的权力受到威胁。

六、总结

本文从社会网络的概念出发,诠释了社会网络的内涵、不同的度量方式以及在微观行为中的影响。具体而言,作为社会资本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互动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联体系,因共享信息、汲取和控制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在平滑消费、增加投融资、促进就业、减少贫困和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它在资源配置方面可以弥补正式制度发展不足的缺陷。正式制度(如正规金融体系、民主选举)的逐渐发展可能减弱也可能加强原有社会结构中的非正式制度(如社会网络)的作用。

然而,由于社会网络在理论上的宽泛性,实证测度仍是一大难题,目前文献中因研究对象的不同度量差别较大。除少数以外,国内文献主要从

行为指标对社会网络进行度量,然而这些指标难免会产生内生性问题。再者,实证文献中社会网络的度量主要涉及其规模,因数据的天然缺陷也缺乏对社会网络强度的度量。因此,实证上有待进一步的丰富和补充。

另外,社会网络因信息共享、提供担保或风险分担的角色,在资源配置和形成非正式制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能够弥补正式制度发展不足的缺陷。但这种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在正式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将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一问题对理解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非常重要,遗憾的是这方面的文献还相对较少。尤其对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难免会渗透着非正式制度的作用,究竟是非正式制度(如社会网络)起主导作用,还是正式制度(如正规金融、村庄选举等)更为重要?二者之间相互补充还是相互替代的关系探讨,是一项值得研究、亟待弥补的重要工作。

注释:

①详见陆铭和李爽(2008)、张爽等(2007)的研究。

②在农村,祠堂最初的功能是祭祀祖先,而后与祠堂伴随产生组织——祠堂会,成为了宗族内最有力、功能最多的组织,兼有经济、政治、社交等功能的综合单位(林耀华,1936)。因此,祠堂在中国农村社会中的作用不言而喻,也必然成为宗族内部控制的组织机构。类似地,家谱是血缘关系的一种相对正式的体现。按照Freedman(2004)的说法,“血统和家谱是使宗族合理化的手段”。家谱虽然可能存在伪造的成分,并且常常混淆了历史事实,但家谱的存在表明宗族是有组织的。

参考文献:

1. 边燕杰、张文宏:《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2. 陈钊、陆铭、佐藤宏:《谁进入了高收入行业?——关系、户籍与生产率的作用》,《经济研究》2009年第10期。
3. 郭云南、张琳弋、姚洋:《宗族网络、融资与农民自主创业》,《金融研究》2013年第9期。
4. 郭云南、姚洋,Jeremy Foltz:《正式与非正式权威,问责与平滑消费:来自中国村庄的经验数据》,《管理世界》2012年第1期。
5. 郭云南、姚洋:《宗族网络与农村劳动力流动》,《管理世界》2013年第3期。
6. 郭云南、姚洋,Jeremy Foltz:《宗族网络与村庄收入分配》,《管理世界》2014年第1期。

7.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8. 甘犁、徐立新、姚洋《村庄治理、融资与消费保险: 来自8省49村的经验数据》, 《中国农村观察》2007年第2期。
9. 贺雪峰《中国村治模式: 若干案例研究》,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
10. 黄祖辉、刘西川、程恩江《贫困地区农户正规信贷市场低参与程度的经验解释》, 《经济研究》2009年第4期。
11. 胡枫、陈玉宇《社会网络与农户借贷行为——来自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的证据》, 《金融研究》2012年第12期。
12. 胡必亮《“关系”与农村人口流动》, 《农业经济问题》2004年第11期。
13. 李爽、陆铭、佐藤宏《权势的价值: 党员身份与社会网络的回报在不同所有制企业是否不同》, 《世界经济文汇》2008年第6期。
14. 李锐、李宁辉《农户借贷行为及其福利效果分析》, 《经济研究》2004年第12期。
15. 李锐、朱喜《农户金融抑制及其福利损失的计量分析》, 《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16. 李菁、林毅夫、姚洋《信贷约束、土地和不发达地区农户子女教育投资》, 《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6期。
17. 林耀华《从人类学的观点考察中国宗族乡村》, 《社会学界》1936年第9卷。
18. 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与社会地位》, 《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
19. 金烨、李宏彬《非正规金融与农户借贷行为》, 《金融研究》2009年第4期。
20. 陆铭、李爽《社会资本、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 《管理世界》2008年第9期。
21. 刘莉亚、胡乃红、李基礼、柳永明、骆玉鼎《农户融资现状及其成因分析——基于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千社万户的调查》, 《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3期。
22. 刘金海《家族、地缘与“城中村”的选举——湖北省武汉市一个城中村换届选举的实证研究》, 《管理世界》2006年第6期。
23. 马光荣、杨恩艳《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创业》, 《经济研究》2011年第3期。
24. 马晓青、朱喜、史清华《信贷抑制与农户投资回报——云南、宁夏农户调查案例分析》, 《上海经济研究》2010年第9期。
25. 阮荣平、郑风田《市场化进程中的宗族网络与乡村企业》, 《经济学(季刊)》2012年第12卷第1期。
26. 彭玉生《当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范发生冲突: 计划生育与宗族网络》, 《社会》2009年第29卷第1期。
27. 史清华、万广华、黄璐《沿海与内地农户家庭储蓄借贷行为比较研究——以晋浙两省1986-2000年固定跟踪调查的农户为例》, 《中国农村观察》2004年第2期。
28. 孙秀林《华南的村治与宗族——一个功能主义的分析路径》, 《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
29. 肖唐镖《什么人在当村干部? ——对村干部社会资本资本的初步分析》, 《管理世界》2006年第9期。
30. 杨汝岱、陈斌开、朱诗娥《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的农户民间借贷需求行为研究》, 《经济研究》2011年第11期。
31. 张爽、陆铭、章元《社会资本的作用随市场化进程减弱还是加强? 来自中国农村贫困的实证研究》, 《经济学季刊》2007年第6卷第2期。
32. 周群力、陆铭《拜年与择校》, 《世界经济文汇》2009年第6期。
33. 赵剑治、陆铭《关系对农村收入差距的贡献及其地区差异——一项基于回归的分解》, 《经济学季刊》2009年第9卷第1期。
34. 章元、陆铭《社会网络是否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 《管理世界》2009年第3期。
35. 章元、李锐、王后、陈亮《社会网络与工资水平——基于农民工样本的实证分析》, 《世界经济文汇》2008年第6期。
36. 赵剑治、陆铭《关系对农村收入差距的贡献及其地区差异——一项基于回归的分解》, 《经济学季刊》2009年第9卷第1期。
37. 朱喜、史清华、李锐《转型时期农户的经营投资行为——以长三角15村跟踪观察农户为例》, 《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9卷第2期。
38. 朱信凯、刘刚《二元金融体制与农户消费信贷选择——对合会的解释与分析》, 《经济研究》2009年第2期。
39. 佐藤宏《外出务工、求职和城市劳动力市场——市场支撑机制的社会网络分析》, 载李实、佐藤宏主编:《经济转型的代价——中国城市失业、贫困、收入差距的经验分析》,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40. Attanasio, O., A. Barr, J. C. Cardenas, G. Genicot, and C. Meghir, 2012, “Risk Pooling, Risk Preferences, and Social Network”,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Vol. 4, No. 2, pp. 134-167.
41. Ambrus, A., M. Mobius, and A. Szeidl, “Consumption Risk-Sharing in Social Networks”, Harvard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2010.
42. Angelucci, Manuela, Giacomo DeGiorgi, Marcos-Rangel and Imran Rasul, 2008, “Insurance in the Extended Family”, University of Arizona Working Paper.
43. Bassat Avi and Momi Dahan, 2010, “Social Identity and Voting Behavior”, *Public Choice*, Vol. 160, No. 2, pp. 1-22.
44. Banerjee, A., A. Chandrasekhar, E. Duflo, and M. Jackson, 2012, “The Diffusion of Microfinance”, NBER-Working Paper No. w17743.
45. Bourdieu, Pierre, 1986, “the Forms of Social Capital”, I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dited by Richardson, John G., and C. T.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46. Bian, Yanjie, 1997, “Br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Connection Bridge, and Job Search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2, No. 2, pp. 266–285.

47. Bian, Y. J. and J. R. Logan, 1996,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 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1, No. 5, pp. 739–758.

48. Bramoulle, Yann, and Rachel Kranton, 2007, “Risk-Sharing Network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Vol. 64, No. 2, pp. 275–294.

49. Bloch, F., G. Genicot, D. Ray, 2008, “Informal Insurance in Social Networks”,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Vol. 143, No. 2, pp. 36–58.

50. Burt, Ronald, 1992,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al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51. Chantarat, S., and C. Barrett, 2011, “Social Network Capital, Economic Mobility and Poverty Traps”,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Vol. 2, No. 2, pp. 1–22.

52. Coleman, James, 1990,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 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53. Coate, S., M. Ravallion, 1993, “Reciprocity without Commitment: Characteriz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Informal Insurance Arrangement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40, No. 2, pp. 1–24.

54. Chen, Zhao, Shiqing Jiang, Ming Lu and H. Sato, 2008, “How do Heterogeneous Social Interactions Affect the Peer Effect in Rural–Urban Migr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 LICOS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227.

55. Chen J. and Narisong Huhe, 2010, “Social Networks, Informal Accountability,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A Reassessment”, APSA 2010 Annual Meeting Paper, No. 1658593.

56. Calvo – Armengol, A., M. Jackson, 2004, “The Effect of Social Network on Employment and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4, No. 3, pp. 426–454.

57. DeWeerd, Joachim, and Dercon Stefan, 2006, “Risk-Sharing Networks and Insurance against Illnes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81, No. 2, pp. 337–356.

58. Dolfin, Sarah, and Garance Genicot, 2010, “What Do Networks Do? The Role of Networks on Migration and ‘Coyote’ Use”,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14, No. 2, pp. 343–359.

59. Emirbayer, M. and J. Goodwin, 1994, “Network Analysis, Culture, and the Problem of Agenc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9, pp. 1411–1454.

60. Fafchamps, Marcel, and Gubert Flore, 2007, “Risk Sharing and Network Form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7, No. 2, pp. 75–79.

61. Fafchamps, M., and S. Lund, 2003, “Risk-Sharing Networks in Rural Philippin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71, No. 2, pp. 261–287.

62. Freedman, Maurice, 1971,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 London: Athlone Press.

63. Freedman, Maurice, 2004,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 Oxfordshire: Berg.

64. Granovetter, Mark,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78, No. 6, pp. 1360–1380.

65. Grootaert, C., 1999, “Social Capital, Household Welfare and Poverty in Indonesia”,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148.

66. Gajigo, O. and J. D. Foltz, 2010, “Ethnic Networks and Enterprise Credit: The Serahules of the Gambia”, CAES & WAEA Joint Annual Meeting Working Paper.

67. Huang, Xiyi, 1998, “Two-way Changes: Kinship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 in Village Inc.: *Chinese Rural Society in the 1990s*, Edited by Christiansen, Flemming and Junzuo Zhang (ed.): Richmond, Curzon Press, pp. 177–192.

68. Jacobs, Jane, 1961,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69. Karlan, D., M. Mobius, T. Rosenblat, and A. Szeidl, 2009, “Trust and Social Collateral”,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4, No. 3, pp. 1307–1361.

70. Karlan, D., 2007, “Social Connections and Group Banking”,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17, pp. 52–84.

71. Karlan, D. and J. Morduch, 2010, “Access to Finance”, in Rodrik, Dani and M. Rosenzweig (Ed.),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5.

72. Kinnan, Cynthia and R. M. Townsend, 2012, “Kinship and Financial Networks, Formal Financial Access and Risk Reduc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2, No. 3, pp. 289–293.

73. Jalan, Jyotsna, and Martin Ravallion, 1999, “Are the Poor Less Well Insured? Evidence on Vulnerability to Income Risk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58, No. 1, pp. 61–81.

74. Lin Nan, 1982, “Social Resources and Instrument Action”, in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 Work Analysis*, Edited by Marsden, Peter, Nan Lin, and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Inc..

75. Luke, Nancy, and Kaivan Munshi, 2007, “Social Affiliation and the Demand for Health Services: Caste and Child Health in South Indi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83, No. 2, pp. 256–279.

76. Mitchell, J., 1969, “The concept and use of social networks”. In J. Mitchell (Eds), *Social networks in urban situation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77. Munshi, Kaivan, and Mark Rosenzweig, 2009, “Why is Mobility in India So Low? Social Insurance, Inequality, and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 No. w14850.

78. Munshi, Kaivan, and Mark Rosenzweig, 2006, “Tra-

ditional Institutions Meet the Modern World: Caste, Gender, and Schooling Choice in a Globalizing Econom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6, No. 4, pp. 1125–1252.

79. Munshi, Kaivan, 2003, “Networks in the Modern Economy: Mexican Migrants in the U.S. Labor Marke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8, No. 2, pp. 549–599.

80. Munshi, Kaivan, 2011, “Strength in Numbers: Networks as a Solution to Occupational Trap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78, No. 3, pp. 1–33.

81. Munshi, Kaivan, and Mark Rosenzweig, 2008, “The Efficacy of Parochial Politics: Caste, Commitment, and Competence in India Local Governments”, Economic Growth Center Discussion Paper No. 964.

82. Mogues, T., M. R. Carter, 2005, “Social Capital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Economic Inequality in Polarized Societies”,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Vol. 3, No. 3, pp. 193–219.

83. McKenzie, D. and H. Rapoport, 2007, “Network Effects and the Dynamics of Migration and Inequality: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Mexico”,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84, No. 2, pp. 1–24.

84. Madison James, 1787, “Federalist 51”, In the Federalist Papers, Eds. by Hamilton Alexander, James Madison and John Jay, Published by Penguin Press.

85. Maskin, Eric, and Jean Tirole, 2004, “The Politician and the Judge: Accountability in Governmen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4, No. 4, pp. 1034–1054.

86. Narayan, D. and L. Pritchett, 1999, “Cents and Sociability: Household Income and Social Capital in Rural Tanzani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47, No. 4, pp. 871–897.

87. Nee, V., 1996, “The Emergence of A Market Society: Changing Mechanism of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1, No. 4, pp. 980–949.

88. Rona-Tas, A., 1994, “The First Shall be Last? Entrepreneurship and Communist Cadre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0, No. 1, pp. 40–69.

89. Putnam, R., R. Leonard and R. Nanetti,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90. Peng, Yusheng, 2004, “Kinship Networks and Entrepreneurs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9, No. 5, pp. 1045–1074.

91. Rosenzweig, Mark, 1988, “Risk, Implicit Contracts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Areas of Low-Income Countries”,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98, No. 393, pp. 1148–1170.

92. Rosenzweig, Mark, and Oded Stark, 1989, “Consumption–Smoothing, Migration, and Marriage: Evidence from Rural Indi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7, No. 4, pp. 905–926.

93. Samphantharak, Krislert and Robert M. Townsend, 2010, “Households as Corporate Firms: An Analysis of Household Finance Using Integrated Household Surveys and Corporate Financial Accounting”, in *Econometric Society Monograph 46*.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4. Townsend, M. Robert, 1994, “Risk and Insurance in Village India”, *Econometrica*, Vol. 62, No. 3, pp. 539–592.

95. Townsend, M. Robert, 1995, “Consumption Insurance: An Evaluation of Risk-Bearing Systems in Low-Income Economie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9, No. 3, pp. 83–102.

96. Tsai, L. Lily, 2007, “Accountability without Democracy: Solidary Groups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7. Watson, James, 1975, “Emigration and the Chinese Line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98. Xu, Yiqing and Yang Yao, 2009, “Social Networks Enhance Grassroots Democracy: Surname Groups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CCER Working Paper.

99. Zhang, Xiaobo and Guo Li, 2003, “Does Guanxi Matter to Nonfarm Employment?”,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31, No. 2, pp. 315–331.

100. Zhao, Yaohui, 2003, “The Role of Migrant Networks in Labor Migration: The Case of China”,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Vol. 21, No. 4, pp. 500–511.

责任编辑 董希望

ABSTRACTS

The Concept , Measure and Impacts of Social Network: A Literature Review (122)

Guo Yunnan¹ , Zhang Jinhua² , Huang Xialan¹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 Beijing 100029 , China*; 2. *College of Trade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Hangzhou 310023 , China*)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concept of social network , this paper interprets its meaning , different measure methods and the impacts on the microeconomic behaviors. Specifically , as a kind of social capital , social network plays important roles in smoothing consumption , increasing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 promoting employment , reducing poverty and improving income distribution because of its advantages in sharing information , providing guarantees and sharing risks. Also as an informal institution , social network can compensate for the defects of the formal institutions in resource allocation. More importantly , the gradual development of formal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formal financial system , democratic elections) may weaken or strengthen the impacts of the social network in its former structure.

Key words: social network; social capital; informal institution; literature review